

丹东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
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1990

丹 东 文 史 资 料 (第六辑)

丹东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75,000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(丹东)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00

准印证：丹文内登第040号

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目 录

庠序沉浮一老翁

——记王奉璋的一生……………王作礼 (1)

李赓襄呕心办学二十载……………林懋功 (25)

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……………白世俊 (38)

忆就读“抗日救亡大学”后的战斗生涯

……………赵可全 (44)

日寇推行的奴化教育……………夏德远 (63)

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……………辛国祥 (75)

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

……………阎明诗 (86)

第二次解放和建国初期的安市市文化馆

……………戴卫江 (94)

医药界名人姚子扬……………王云峰 (106)

日伪时期凤城的工商业……………秦玉武 (112)

庠序沉浮一老翁

——记王奉璋的一生

我是王奉璋的第三个儿子，对父亲的一生，我知道的并不全面，只能把记忆比较深的印象写出来。

一、先祖渡海到辽东

我的高祖王作发，本籍是山东省登州府福山县古现村。远祖式微，单传七世，至祖公作发，生计益窘，乃与原配李氏，携女航海而来辽东登岸，至复县东磴的宋屯租房而居，出佃而农。至清道光三年，始以制钱二百三十吊，典房地而入籍了。

高祖无子嗣，某日，作发公到城办事，宿王家店，当时十月，天寒微雪，院里一名贫儿约五六岁，赤身露体，与犬同食，引起作发公怜悯之情，问诸店主。主曰：此儿无家，来店月余，驱之不去，亦无恤之者，故与犬同卧同食，公既无子，可子矣。既拯其命，且得嗣焉。公竟

动，店主向公索钱二十吊，为儿购置衣裳，认公为父，从公而归，名命玉基，为之订婚。

时公年四十余，由此家渐充裕，乡里见公家道有成，虽有养子，宜昌血统，乃劝公娶傅氏，仍与李氏同居。傅氏于道光二十六年生吾祖，命名振基，继生兴基、喜基、财基。公于同治二年七月卒，逾年正月十五日复生遗腹永基与玉基，兄弟共六人。

后来，丧事频来，家道衰落，乃于同治五年十月六日，兄弟六人拆居。兴基随其岳家金姓赴东丰，玉基迁通化。同治八年，吾祖振基，携其母弟来安东。

二、茹苦读书

曾祖父王振基，生育子五女五。为谋求生活之路，把家搬到安民山前。

陈翼长巡视东边道，决定成立安东县，要把县城设在安民山前。安民山前打出了街道，定出了号地，曾祖父振基买了一个号地，领着五个儿子盖上了房子，就开上木匠铺，从此，十里八村的人，都称“王家木匠铺”了。

祖父王伯忠，年二十娶由氏为继室，生我父命名温厚，字仁亭，号奉璋。父亲有弟弟二人，

妹妹三人。

曾祖父对我父亲说，你一定要读书，咱们不求升官发财，只希望你能拿起个“戒尺板子”（当教书先生）就可以了。自此我父亲进了私塾。

父亲十二岁时，经他的祖父振基送入私塾，学规颇严，每有一字不识，师必责教。父因背书不熟，手曾被老师用板打得红肿，归不敢言，我祖母知之，仍以严肃的面孔教育我父亲“一定把书学好”。

父十七岁，叔叔十三岁，兄弟二人读书。祖父因病故去，祖母早起晚睡，编苇席子维持生活。

父二十二，考入安东师范讲习所（后改为师范简易科），虽有官费，但是，零用自备。这时，仍靠我祖母由氏织席补助，加上我妈在结婚时带来的几个钱补助父亲穿的。在安东师范讲习科攻读四年期间，月考、期考、年考、毕业考试，共四十八次，每次都名列第一。

三、刚直闯宦途

师范毕业了，他被派到安东县龙泉山、汤山城高等小学当校长。后来，被派到庙沟办高等小学，他看到教室不足，就亲自领人把庙里的泥

胎佛像打碎清除干净改为课堂。

毁庙办学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事，惹起了当地士绅财主的反对，联名写信控告到县衙门，父亲决心离开庙沟。

离开庙沟不久，父亲担任了安东县教育会长职务。

他当教育会长，真想把安东县的教育办好。可是，教育经费被安东县知事陈叔六贪污了。他一气之下，一面亲自贩卖稗草解决教育经费，一面写信把陈叔六告到南京政府。

陈叔六的根子很粗，在南京政府里有人，时间不长，陈叔六被调走了。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，还调到别处高升了。

父亲贩卖稗草想解决教育经费，不但没解决反而赔了帐，他一看没有路可走了，便毅然辞掉了教育会长职务。

张作霖在东北当督军，搞了一次考俊士，父亲考上了俊士，因为成绩优秀，是普通文官荐任存职。

他被派到锦西、义县当劝学员。交通不便，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匹枣红马骑着。劝学员的工作是不好干的，挣几个钱不够养活家口，况且离家数千里，他就辞了职，骑着枣红马回家了。

奉天省公署，省长王永江派他到复县公署当科长，他在复县工作了六年，地方上的区官准备给他用设赌抽红的办法弄些钱财，每次都被他拒绝了，接着他又转到镇东、清原等地当科长。

父亲在外边干事情，没有带家眷，每年只回家一次，都是腊月二十六七回家，过了正月初三就往回返。

每次父亲回家时，我祖母由氏都嘱咐他说：

“咱家是穷人，你在外边做官，千万不要贪赃枉法，不要花不义之钱……”父亲把祖母由氏的良母事迹呈报了奉天省公署。后来，奉天省长王永江发给了褒奖证书和大匾额一幅，上边写着“彤管流芳”四个大字。

张作霖为了安排张作相相当个省长，特地将洮南县改为洮南市作为省会，派我父亲去洮南市当市长。

他在洮南市当市长仅一年多些时间，一个沙土扬天、只有马市的市，没有什么大事可做。年终回家过春节，他决心不再回去当市长，把行李统统带回家了。因为他算了一笔帐，当市长一年的薪水所得的奉票，带回安东兑换小银元，还比不上乡下的一位小学教师的薪水多，怎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呢？

一九三〇年（民国十九年），他在家里和叔父一起种地，自己家里的地不够种，又向地主租了两天（十二亩）地。他整天赶着车，驾辕的是从义县骑回来的老枣红马，一条毛驴拉套、拉泥、拉粪、种地、拉草……当地的士绅见了都称赞他是好样的：“出外做官，回家赶车种地”。

我家住的破草房子几年一苫，泥打的墙一年一抹，屋里没有棚子，墙壁上的几张纸，都是每年春节前的一两天糊上几张旧报纸。父亲在外边干事，积攒几个钱，除了还上了祖辈分家时分得的八百元小洋钱的“饥荒”外，又打发我三个姑姑出嫁用了。

他每次回家过春节时，下了火车，就到大买卖家里打个小年纸包，里边包的是香纸、蜡烛、红糖、白糖、红枣、二斤糕点，还有按家里人数买的每人一双袜子、一副腿带，有时买个灯罩，有时买套茶壶、茶碗。

在家种地的时间不长，东边道林科高级中学校长李赓襄，原来也是父亲在师范读书时的校长，他听说父亲辞官在家种地了。几次托人捎信，请他到林科中学教国文，父亲考虑到家庭生活，就答应了。

到了林科中学，李校长让他担任高中三年级

的国文和经学教师，在校务分担上给了训育员的职务。

四、亡国的大祸临头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，几百名关东军乘坐满铁的火车，一天功夫就占了安奉铁路沿线。学校关门了，学生回家了，父亲也只好回家收割庄稼了。

第二年学校又复课了。父亲又回到林科中学任教员。学生用的课本，仍然是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还作为学生的必修课。学校增加了日本人教日语，姓永田，原是七道沟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。他来到学校只知教授日本话，别的事情一概不管。学生经常和他开玩笑，明里暗地里称他是“小头鬼”。

日寇依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在较短的时间里，占领了东三省，但因有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的活动，使其统治很不稳定。于是，关东军决定实行“思想讨伐”政策，目标是对着知识界、教育界、工商界里的著名人物，尤其是对着所谓“反满抗日”活动分子。

1936九月末（阴历），冷气袭人，林科中学的学生，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簇地低声暗语议论

着不幸的消息，秦校长、李教务长、侯训育主任，还有伪安东省公署的教育厅的孙厅长、安东县教育局邓局长等等，都被宪兵队、警察厅抓去了。

阴历十月初五的晚间，熄灯铃打过了，我在父亲的住室里已经脱下衣裳刚刚躺好，父亲到各寝室去查看回来，屁股没等坐下，外边敲了几下门，进来两个中国人，头戴礼帽，身穿西装，手提文明棍，戴着眼镜，面带冷笑地说：“你是王奉璋吗？”

“是！我就是王奉璋。”父亲直率地回答。

“警察厅有事请你去一趟！”一个说。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父亲马上想到秦校长等人被抓的情景。

“啊，马上去。”

父亲立刻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跟着两个特务走。有个特务假惺惺地说：“天气比较凉些，你把风衣穿上，别受凉了”。

话刚说完，两个特务忙在父亲摆着书的桌子上翻来翻去，约有二十分钟，父亲把衣服穿好了，特务也把各种书籍翻了一遍，有个特务来到我的床边，假装和气地说：“小孩，你不要害怕，告诉你们家里人，你父亲去一趟，很快就会

回来的！”

特务把父亲带走了，不到五分钟，一阵阵警笛声，从外边传来，几辆警车亮着刺眼的灯光，一溜烟地奔驰而去。

父亲被带到安东警察厅，进门一看，地板上坐的全是教育界、工商界的头面人物，人都靠墙跟坐着，中间有个木桶，是小便大便使用的器具。

一天三顿饭，全是些小窝窝头，一块咸萝卜，给点水是喝的，不是给洗脸用的。

在警察厅里只问了参加抗日救国会的经过，组织人员名单，谁参加了？父亲始终以“不知道”对付他们，在警察厅住了一个星期，便被送到日本守备队了。

二三十人，住在日本守备队的马房里，三间大房子是砖瓦建筑的，高大宽敞，没有间壁，地面是水泥抹的。这房子本来是守备队用来拴马的，这次为关押中国抗日分子，才倒出来的。水泥地面上放几张苇席子，给被捕的人当炕席用。守备队通知被抓者的家属送行李，只准许送一褥一被。

一九三七年元旦过去了，日本守备队来电话告诉我们，快到守备队去取行李。

去守备队那天大雪刚停，马路上冰天雪地，我和叔兄俩走进日本守备队的办公室，有位中国人是翻译，金县人。他说：“你父亲是前天夜间坐火车到奉天（即沈阳）的，你父亲没有什么事情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日本兵把我俩带到马房里，只看见父亲的被褥放在一角。我们打开一看，里边沾满了紫红色的血迹和脓水，见此情景，十四岁的我，忍不住悲痛之情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祖母盼儿脱离虎口，受了我二舅爷的嘱咐，吃素念经，祈祷观世音菩萨保佑。母亲成天吃不下饭，身体虚弱成病，亲友经常到家打听消息，并对祖母和母亲极力安慰。

父亲在奉天日本宪兵队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。腊月二十八日午后一点左右，看守进来，叫喊说：“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等汽车来了好上车。”接近两点钟，院里来了汽车。看守叫安东来的十一名“罪犯”，有教育厅长孙文敷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、安东教育局长邓仕仁等人（这是被枪毙的），不大功夫就被汽车拉走了。看守又叫了二十多名被判十五年徒刑的。第三次叫的是被判十三年六个月的。最后叫到我父亲，约有十几个人，被带到日本官面前，日本官说，放你们回

家，要安分守己，你们是属于“要案视察人”。

释放了，父亲走出了监狱的大门，要回家可一分钱没有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忽然想起一位在奉天开个小店的乡亲，在他那里借了路费，坐火车回到安东。

父亲进了家门，放声大哭，全家老小都哭起来了。父亲听说祖母由氏为使儿子脱出虎口而吃素，更是泪流不止。以后，每当吃饭时看到祖母吃素，更燃起我对日寇的仇恨之火。

正月初一，父亲声泪俱下地向全家人诉说起被捕后的情况：

在警察厅里，只是问一问；几天后，便到了日本守备队，进行酷刑逼供。第一次是灌凉水。把父亲绑在板凳上，日本兵掐着水管子往父亲的嘴里灌凉水，灌了一阵子。逼问父亲，什么时候参加的救国会？父亲闭着嘴，表示什么也不知道。日本鬼子停下了灌水，让父亲回去好好想一想。不久，进行第二次是坐老虎凳。第三次是“上大挂”……。父亲忍着酷刑拷打，始终没有讲，只说有学生会、教育会，没听说有救国会。

因为日本鬼子使用胶皮轱辘的带子打人，使父亲胸前、背后和头上生了一年多毒疮，经过用艾蒿水洗，才慢慢地好了。

由于父亲是“要案视察人”，所以，警察、宪兵，三天两头到家查问，到那里去啦？谁到过我家来等等。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还逼着父亲写了一篇“感想”。一九四三年，伪满皇帝到安东视察。没来之前，安民分驻所警察把父亲送到大东沟警察署拘留，每天三顿饭，都由我四祖父家里送去的。溥仪回到了新京（长春），才把父亲放了回来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，压在我头上的国事犯帽子可算拿掉了。”父亲给了我两角钱，叫我到安市里买些红绿纸、孙中山的像，要好好庆祝庆祝。

五、第一任的教育厅长

一九四五年九月间，伪满时的安东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，被安东地区治安维持会改名为安东农林中学，由董以军代理校长。董以军是我父亲的学生，邀请我父亲来校帮他掌管学校，于是，我父亲便来到农林中学当国文教师。

当时学校里有些教师和学生，常常以伪满统治时的一套教学、管理方法进行工作和活动，为此，我父亲针对当时情况便指出，日伪统治下的

教育是“奴化教育”，应当废除。使教师和学生脑子里有个正确的认识。

社会上当时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诽谤性言论，如说安东市的八路军，南京不承认，延安也不承认，中央军来不了，是因为土匪扒坏了铁路造成的……

父亲在课堂上或在全校师生朝会上向学生讲，我们被日寇统治了十四年，对祖国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，不要轻信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，学生就是要安心读书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

十月末的一天上午，安东的“大学联盟”派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卢英权，一个是李瑞文。卢英权向学生讲，日本投降了，土匪到处扒铁路，使中央军不能接收。青年人在伪满时要想爱国没有机会，现在正是机会，我们要武装起来，去欢迎中央军来接收。

他俩走后，全校师生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向学校说明，我们学生就是读书，伪满时我们没能起来抗日。现在光复了，我们怎能拿起枪，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？

不久，发生了“三股流反革命暴乱”。八路军团长王选桥，带领战士把反动武装全歼后，问学生俘虏，你们学校里的老师有没有叫王奉璋